

第 一 章

湖湘文化与湖南近代文学概况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民族。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 因地理、历史、语言、风俗习惯等原因而形成了多个文化区域。这些区域的文化各具特色 但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湖湘文化是其中卓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湖湘的“湖”，指洞庭湖。湖南位于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湘”指湘江，它是长江的支流，是湖南境内纵贯全境的最大的河

流，后来成为湖南的代称。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湖南境内便有古人类繁衍生息。而可考的古代湖湘文化的历史大约开始于新石器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湖南境内活动的居民主要是三苗和杨、越。这些部落或部族，有的是原来土生土长的湖湘先民，有的是在炎、黄至尧、舜、禹三代由中原地区南迁的部落，如被炎帝打败的蚩尤部落、被黄帝打败的炎帝部落、被禹所取代的舜帝部落等，都先后南迁湖南的偏远之地。大约在炎帝部族南迁的同时，原居住于西北黄土高原与炎帝部落有亲缘关系的祝融部落也南迁至长江流域。南迁后祝融部落逐渐脱离炎帝部落集团而投向了黄帝部落集团，并受到黄帝的重用。部落酋长重黎氏在帝尝时被任为“火正”，命曰“祝融”。祝融氏部落在长江流域与当地三苗和杨、越等土著民族逐渐融合，发展颇快，后来繁衍为八大支系，遍布于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至商周之际，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部族集团，即所谓的“荆蛮”。商朝末年，荆蛮中占主体地位的鬻熊部落归附于周，协助周武王灭商，有功而被封建国。至周成王时，正式被封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此后，楚国势力继续向东、向南扩张。周夷王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①又越过洞庭湖，进入湖南，并融合部分三苗和杨、越土著，成为湖南的主要居民。春秋时，许多楚国贵族被迁封于湖南，洞庭湖东部地区遂成为其统治区。春秋晚期，楚人又进入湘西、湘西南及湘北的武陵。战国初，楚人又进一步征服湘东、湘南、湘西南的越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整个湖南也就成为楚国的一部分了。楚文化也随之而渗入湖南的各个地区，并与当地原有土著蛮族文化相

《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 第1691、1692页。

融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湘楚文化。湘楚文化当然是荆楚文化的一个分支，因而它既有楚文化的一些共同特征，也具有湖湘特色。虽然这种特色开始并不太明显，但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得日趋鲜明。

楚文化约形成于春秋至战国中期，它融合了周边地区的异族文化，即三苗、古越、巴人等少数民族的蛮文化，同时又特别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而成。楚人把北方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入湖南，使湖南地区的农业、林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也创造了新兴的封建制度文化和充满神奇色彩的精神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霸蛮精神。楚人长期生活在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江南，这里到处是高山峻岭、急流险滩、湖泊沼泽，人类在这里生存十分困难。周围的少数蛮族部落经常相互格斗，也时常侵扰已构成部族和国家的楚人。楚人在这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从而锻炼出了一种刚毅果敢、坚忍不拔、不信鬼、不信邪的气性。二是浪漫气性。荆湘地区的土著民族原来大都信奉原始宗教，各自崇拜其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有着形形色色的神话传说。楚人南下后，又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两种宗教和神话传说融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种光怪陆离的宗教和神话系统。楚人光怪陆离的宗教和神话又反照于文学，为文学创作所吸收，于是就产生了具有浪漫色彩和地域色彩、情感激越、声调悠扬、想象丰富的楚歌和楚辞。三是爱国。楚部族本是由一个血缘关系非常紧密的部落繁衍发展而成，其宗法色彩十分浓郁，敬神爱祖之风远胜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其他国家。由敬神爱祖进而延至热爱其宗主之国。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之土，尤其是三晋之土，多朝三暮四，往来奔走于各国之间，独楚国之士很少效力于他国。屈原虽不得志于楚，但却眷恋着他的

祖国而不肯他适，宁可葬身江流也不离开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此外，隐逸之风也是在楚人中最先形成。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一些失意的政治家和具有出世思想的士人往往南下至楚，隐居于南方青山秀水之中。老子、接舆、庄子、屈原时的渔父等都是，从而形成了一个隐士阶层，形成隐逸之风。这个隐士阶层以清静无为作哲学基础，以自然为最高境界，以保全自然生命为宗旨，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文化意蕴。

秦统一中国，楚人的反抗精神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楚人有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陈胜、吴广首先揭起反秦大旗，接着项梁叔侄、刘邦等楚人纷纷揭竿而起，前仆后继，很快就将秦王朝推倒。后来又由刘邦集团统一了天下。刘邦集团以楚人为主，于是楚文化迅速推向全国，“汉文化即楚文化”作为楚国文化特产的辞赋和楚歌也传遍关中和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北方地区陷入长期战乱，人口大量南迁，经济和文化中心南移，包括湖南在内的荆楚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荆楚文化也得到加速的发展。三国魏晋时期，湖南开始出现有影响的文化人物，如曾当过蜀国尚书令的衡阳人刘巴、蜀国后期的丞相湘乡人蒋琬。东晋时有著名学者耒阳人罗含和著名史学家邓粲，南朝有文学家澧州人阴铿和车胤，著名地学家武陵人黄闵和伍安贫等。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里，荆楚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北方人口继续南迁，特别是安史之乱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人口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南方人口大量增加。《旧唐书·地理志》说：“自至德（唐肃宗年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及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并邑，十倍其初。”特别是从唐开始，荆湘地区成了王朝官员和文人的贬放之地。宋之问、王昌龄、元结、柳宗元、刘禹锡等众多文学之

士先后南贬湖湘，还有韩愈、李白、杜甫等也先后流落湖南。他们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荆楚地区、湖湘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湖南本地文人、学士和作家也开始成批地出现，如唐初书法家欧阳询，盛唐书法家僧人怀素，宣宗朝的湖南“破天荒”进士、文章家长沙人刘蜕，著名诗人澧州人李群玉，懿宗时有著名咏史诗人邵阳人胡曾，昭宗朝有进士、诗人衡阳人曹松，还有著名诗僧益阳人齐己等。

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是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湖湘文化得以从荆楚文化独立出来的重要时期。五代时期，马楚政权割据湖南五十多年，这是历史上惟一以湖南为中心而建立的国家政权。在这五十多年中，湖南境内比较安定，马楚统治者又比较重视文化建设，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有名望的文人学士，如天策府以李宏皋、廖匡图、何仲举为首的十八学士和欧阳彬、廖凝、邓洵美等文士，这就为湖湘文化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由马楚割据至北宋王朝，湖南是以和平为主的方式归入大宋的，境内经济、文化等均未受到大的破坏和摧残。因此，进入北宋后，湖南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比较快。北宋初，湘人周敦颐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佛、老二家的一些哲学要素，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开理学之先河。周氏的学说经由程颐、程颢兄弟及其门徒的传播和发展，就开始兴盛起来了。

由于北方的夏、辽、金和蒙古的相继南侵，迫使宋王朝将政治、经济重心一步步向南转移。至南宋时，湖南就成了宋政权经济的主要支柱，宋王朝的粮仓，也成为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许多著名官员、学者、文学家被遣或被贬至湘，仅永州一地就先后有周必大、汪藻、陈与义、杨万里、胡铨、张浚、范成大等在这里做官或居住过。他们在湖南兴办书院，授徒讲学，为湖南文化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两宋时期，湖南的书院教育蓬勃兴起，其中

规模较著的就有十多所，全国“四大书院”，湖南居其二。由于教育的兴盛，湖南开始出现人才蔚起的现象，产生了一大批理学、经学、史学、地学和文学家。经学家有宁乡易祓、武陵丁易东、永明周尧卿等；史学家有湘潭路振、祁阳陶岳、湘乡王容、衡阳郑向、茶陵谭世选、武陵丁特起等；地学家有衡山李芾、南岳释文政和道士陈田夫、衡阳宋刚仲等；诗人有潭州刘翰、宁远乐雷发；词人有湘潭王以宁；散文有潭州邢天荣、湘潭钟将之、衡阳廖行之等；书法家有潭州刘次庄、沅陵单炜；画家有潭州武洞清、衡州释仲仁；医学家有湘乡朱佐、衡阳宋永寿等。

南渡后，一些中原、江浙学者避地湖南，特别是一批程门弟子长期寓居湖南，从事著述，开办书院，传道授业，形成了一个传播理学的网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湘籍学子。洛学之集大成者崇安胡安国于北宋末年西入湖南，在南岳紫云峰下建碧泉书堂，从事著述和讲学，与其子胡宏等开创了湖湘之学统。胡宏高足张栻绍圣间讲学岳麓书院，致力于培养湘籍学子，传播理学，他又邀来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来湘讲学，研讨学术。朱熹之后，又有其弟子蔡元定、再传弟子真德秀以及真德秀齐名的魏了翁等先后入湘为官、办学和讲学，从而大大地发展了湖湘之学。与此同时，湘籍学子中也涌现出一批理学名家，如醴陵吴猎、平江吴雄、湘潭钟如愚、零陵蒋复等，从而使湖南理学的宣传和传播达到了高潮，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别具一格的湖湘学派。宋代湖湘学派以胡安国父子、张栻等为代表，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湖湘学派继承了周子、二程的心性义理之学，讲求心性的修养。他们很重视作为天地宇宙本体的“理”，更重视体现性理的“心”，认为“心”是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理”与“心”是相即相随的，二者不可分离，但二者并不是一码事，只有通过心性的修养即“养心”、

“存心”、“洗心”、“正心”，才可达到二者的统一，故而极力提倡心性的修养。第二，重视经世务实。湖湘学派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他们把《春秋》当作经世大法，力图为现实提供法度和原则依据，他们提倡实际的生产劳作，重视兵、农等实学。在阐述“知行互发”时，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履践”。第三，爱国爱民，崇尚民族气节，关心社会现实。基于对经世致用的强调，湖湘学派的创始者们非常关心社会现实。胡安国闻宋廷欲割太原、河间、中山等地并纳绢赔款以解东京之围，立即致书当道激烈反对。胡宏多次上书皇帝及当政者，谴责南宋王朝北面事仇，偷安江左，反对投降主义，要求改革弊政，举贤授能。在胡氏父子的影响下，后来有众多湖湘学子投身抗金、抗元的斗争，张栻、吴猎、赵方等都亲自参加了抗金斗争。尤其是南宋末年，湖南境内起兵反元的义军首领大都是岳麓、城南、石鼓、碧泉等书院培养出来的学子。蒙古兵逼围长沙，岳麓书院一百多名学子在湖南安抚使、长沙知州衡阳人李芾的率领下，与长沙军民一起，坚守长沙城达半年之久，最后都壮烈殉难，表现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湖湘学派和湖湘之学的出现，使湖南文化有了自己的特色，从而脱离荆楚文化而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明二代是湖湘文化的调整时期，元代实行种族统治，蒙古人和色目人居于统治地位，汉人尤其是南人受到压制。教育受到摧残，许多学校、书院被毁，长期未得恢复，科考基本被废，人才难以脱颖而出。即使后来恢复科考，南人在乡试中录取比例也不高。有元一代，科考不过二十余次，湖南乡试中举者统共才二百多人，成进士而入选为官者才八十多人，其中还有近 1/3 是蒙古和色目人。元代的湖南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政治、学术和文学人才，如欧阳

玄、冯子振、陈泰、李祁、胡天游等，但其人数和成就都无法与南宋时期相比。元末明初，湖南境内经历了数年的战乱和兵燹，大量土地荒芜，不少田园遭废弃，境内经济几同荒漠。境内居民或死于战乱和兵燹，或大量逃往外省。随后，又有大量外省居民，主要是江西居民以从军、屯垦、宦游、经商等方式，大批涌入湖南。据了解，现在湖南东、北、中、南地区各种姓居民，十之八九来自江西和其他省份。同治《醴陵县志》也记载说：“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存数户，后之人多自豫章来。”而醴陵“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洪武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犹多”。可以说湖南居民来了一次大换血，原有的湖湘文化传统也势必来一次大的调整。同时，元代本就不多的府州县官学和书院多数在元末被毁，经过七八十年的时间，直到正统、景泰间才得以全部重建和恢复，因而明初的几十年间，湖南的文化也处于半荒芜状态。明前期，湖南文学人士仅刘三吾、夏元吉、王伟等数人，且成就均不高。至成化、弘治后，新一代的人才开始崛起，文学有茶陵诗派的开创者李东阳，成员何孟春、彭民望等，又有巴陵杨一清、宜章邓庠等；经学则有益阳罗敦仁、罗喻义父子，衡阳王介之、临武曹朝节等，史地则有湘潭周圣楷、湘阴夏原吉、茶陵谭希思、长沙杨德远、祁阳邓球等。而理学则为王阳明的心学所统治，正德初，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途经湖南，遂讲学醴陵靖兴寺、泗州寺，后又应邀讲学岳麓书院。嘉靖中，其门徒季本任长沙知府，又借岳麓书院授徒讲学。其后又有王门弟子吉水罗洪先、浙东张元忭、江右邹元标等先后讲学于岳麓书院，于是王学遂盛于三湘大地。不过，王学入湘后，在湖湘学统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不再一味空谈性命，而比较注重实用之学，强调“以理学而抒经济”，重视经世致用。

清代是湖湘文化空前发展的新阶段，清初，湖南在行政区划上完全与荆楚相脱离。成为独立行省后，湖南即加速了其发展的步伐，首先是人口迅速增加，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全省人口达1875万。至鸦片战争前夕，更增至近2000万。其次是湖南的手工业、瓷器生产、有色金属开采以及商业等都在清代中期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清朝统治者从开始就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强调科举之业，从顺治起就恢复了科举考试，顺治、康熙二代皇帝都先后下特诏修复、重建各地学校。湖南各府州县学校在顺治年间均得到了恢复，湘西少数民族地区还新建了一大批学校，各地书院也在康熙、雍正年间全部恢复。在恢复旧书院的同时，各府州县还创建了一大批新的书院。这样，不仅各县都有县学和书院，有的一县有数所书院。至嘉庆年间，全省的书院已发展至近百所，书院在读学生少的几十人，多的达数百人。学校和科举培养了大批人才，自顺治九年至道光二十年，湖南中进士440余人，中举的达数千人，其中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的有14人，为巡抚、侍郎、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的十余人。

清代的湖南，在文化学术方面，开始进入了它的全盛期，湖湘学统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首先是湖湘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清代前中期得到了恢复。明王朝灭亡，清兵南下，在湖南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湖南的抗清力量中既有前明政权的官员和军队，也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余部，更有不少湖南本地士绅和地方武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衡阳王夫之、管嗣裘、夏汝弼、巴陵李兴玮等。王夫之在清兵下湖南时加入抗清行列，与管嗣裘等策划起义，失败后奔桂林投归南明永历王朝，南明灭亡后隐居山林，发愤著书。管嗣裘也是起义失败后投归南明，桂林失陷后削发为僧。李兴玮为临武教谕，清兵围临武，他毅然率士民死守县城，城陷被

俘，不屈而死。其次是敢于斗争、敢于反抗的精神得到恢复和发扬。明代直到崇祯时，湖南才爆发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入清以后湖南人民的起义反抗不绝而且规模比较大如乾隆初年以粟贤、杨清保领导的城步、绥宁农民和少数民族大起义，起义坚持了八个月，波及湘、桂、黔三省十多个县。乾隆六十年，又爆发了石柳邓、石三保等领导的湘黔川苗民大起义，还建立了苗民政权，直至嘉庆二年才被清政府以重兵镇压。第三，出现了不少思想和学术大师，如经学家李文炤、朴学家王文清、经史学家兼教育家罗典，还有被誉为“一代儒宗”的邵阳人车无咎等；文学方面则有湘潭陈鹏年、张九钺、善化唐仲冕、新化欧阳辂等。史地学有宁乡黄本骥、常宁王万澍等，还有兼精地理、兵法、天文的严如煜。清代前中期还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如精通医学的周学霆、常朝宣、陈贤书等，有精于天文学的巴陵人许伯政、石门人吴家庆等。

对湖湘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王夫之。王夫之隐居衡山 40 年，悉心从事著述，著作近百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军事、历史、文学、伦理、天文、历算、佛道等。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王夫之在哲学上批判了佛老哲学宣扬的“虚无”和“寂静”，认为世界不是统一于“无”，而是统一于“有”。世上万物是由阴阳二气化变而成的，整个宇宙充满着实有的“气”。船山的这个实有论，为清初批判理学虚空、倡导务实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运动变化的观点。他认为世上万物是运动变化的，“太虚者，本动者出，动以入动，不息不滞。”而且是静中有动、动静互涵的，“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实际上，他更强调的是“动”与“变”。第三，他批评陆王所宣扬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一种谬说，认为物是客观存在的，“物在心外”。说：“越有

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谓越无山。’同样不是“心外无理”而是“理在事中”因此“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第四他很重视“格物致知”认为“格物”与“致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认识过程中有不同的作用“格物”是实践需耳目、心官并用“致知”是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则主要依靠“心”的思辨作用。他反对朱熹“知先后行”说提出“知行始终不相离”的观点而特别强调“行”的主导作用认为在学、问、思、辨、行五者中“第一刻不容缓者则莫如行”。王夫之所倡导的务实力行，是其学说的根本，是经世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是清代最早提出“史学经世”的人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机枢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①王夫之的经世思想即来源于宋代以来的湖湘学统，而于后世湘系经世之学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

二、近代前期湖湘文化的进步与保守

满清王朝从嘉庆时期开始就日渐腐朽，逮至道光，已是千疮百孔，内忧外患，内外交困。一方面是封建统治机器的全面腐朽僵化，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社会矛盾加剧，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抗租抗捐斗争此起彼伏。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盯上了这块古老而已落后的土地，用洋枪大炮轰开中国国门，将他们的鸦片和洋货源不断地输入，中国的白银则源源不断流出，中国人民在鸦片的熏毒下日渐羸弱。这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士大夫们产生了匡时济世和通过改革弊政来挽救危机的思想意识。在学术上，兴盛了

《读通鉴论》卷六，《船山全书》第十 岳麓书社 1988年版 第225页。

近一个世纪的汉学训诂已趋于衰败，宋学也流于空疏，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此已深感厌倦，他们希望从故纸堆里摆脱出来，研究解决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于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经世派。涌出了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经世致用思想和学风是自宋元以来湖湘之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实践，追求经邦济世是湖湘之学最突出的特征，凡湖南学子几乎人人具有这一特点。因而近代经世派中湖南籍人士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嘉、道年间的湘籍经世派有二类：一是陶澍、贺长龄等封疆大吏，他们都是早期在湖湘尚实的学风中获得了经世才略，具有经邦济世的才干，后来利用自己的权位将经世思想实践施行。陶澍是嘉庆七年举进士而开始步入政治舞台的，官至巡抚、总督。他将自己所强调的“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主张付诸实践，大力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整治河工，改革盐漕弊政，倡兴文教，功绩卓著。贺长龄也在嘉庆中举进士入仕，官到巡抚、总督。他为江苏布政使时，即邀同魏源编撰经世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使经世之学大兴于天下。另一类则是如汤鹏、魏源、严如煜等文人，他们更具有明确系统的经世思想和高超的经世才略，他们多居身僚幕，出谋划策，补阙救弊，又长于著书立说。汤鹏是道光进士，当过军机章京、户部主事、山东道监察御史。他在军机，历览天下章奏，又官户部，明习吏事。在官勇于言事，章奏不绝，罢官后还上条陈，托人转奏。又著《浮邱子》二十多万言，言军国利病，吏治良窳，人情伪，开张形势。严如煜早年就读岳麓书院，对天文、地理、兵法等均有很精深的研究，撰有《三省边防备览》、《苗防备览》、《洋防备览》等作。而湘系经世学派中的杰出代表则是魏源。魏源亦为岳麓书院学子，受湖湘理学和经世学风熏陶颇深，“凡经史及宋、元、明、当代儒生之书，悉究其源流，而务适于用。”地理、财赋、兵阵、礼乐、

算术、佛老等无不深究。道光初即应贺长龄之邀，入其幕编撰《皇朝经世文编》后又入陶澍幕，为陶策划漕粮海运、盐政、矿山开采及币制的改革，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皇朝经世文编》的组织者是贺长龄，而魏源是具体编撰者，其选文所遵循的标准，一是切于事，二是合于今，就是要有有助于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是军事、财政、公共工程、水利四个大的方面。此书问世后，流传极广，人称“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而在湖南，则是“三湘学士，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使湖南经世致用学风愈益浓厚。

咸、同时期，湖南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是一支由书生统领的湘军从这里崛起，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激烈搏斗十多年，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保住了清王朝的统治。湘军的核心领导集团实质上是一个文化群体，是湖湘理学经世派群体。这个群体中人主要出自岳麓、城南、涟滨等书院，都受过湖湘传统文化的熏染，坚定地信奉程朱理学，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罗泽南、江忠源、刘蓉、李元度之属在理学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同时，这些人又深受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他们大都是在年轻时就开始留心经世之学。曾国藩既笃信理学，又始终不忘经济之学，凡天文、历法、农学、舆地、兵法等均有所涉猎，入仕后更悉心世务。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就“究心兵事地理，慨然以天下自任，奴事俗士。院长善化贺蔗农、熙龄伟其才，授以程朱之书，公始折节事学，欲以义理为本，发为事功”。^①他在家书中也说：“多读经书，博及义理之趣，多看经世致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他会试落第后，就埋头研究兵阵、舆地、农学等。罗泽南也是“严义利之间，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地理，

李肖聃：《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4页。

百家著述”。江忠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喜欢与学友研习兵事，谈论练勇打仗之事。因此，他们既具有强烈的卫道精神，当清王朝受到威胁、封建统治受到挑战时就奋袂而起，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同时，他们对社会现实又有清醒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知识和才能，从而能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尤其是，这些人都具有湖南人的那种不屈不挠的“霸蛮”精神：曾国藩一败靖港再败湖口三败三河还遭清廷的猜忌遭地方官员的排挤但他屡败屡战，打掉牙齿往肚里咽，直到取得胜利；曾国荃以三万孤军直逼金陵城下围之数年历尽千难万险抵死不肯稍却最终也取得了胜利。还有，湘军这支队伍，实际上是一支充满了理学文化的特殊军队。它以书生为将帅，军官均由士绅、文士充任，而挑选军官首先是政治、思想条件上有较高的要求，曾国藩要求带勇之人一要才堪治民，二要不汲汲于名利，三要耐受辛苦，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忠义血性”。曾国藩的领导和治兵方法也很特别，他从长沙建军起，就用讲学的方法来教化士兵，除军事训练外，规定每逢三八两日进行政治训练，具体办法是由曾国藩亲自对兵勇训话，重点是纪律教育和“训作人之道”他“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所讲至一时数刻之久，讲述的无非是封建的伦理纲常，把理学中的“仁”“礼”“诚”等道德规范引入治军之中；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王安定《湘军记》就说：“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弟子，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因而整个湘军是一个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政治军事集团，是湖湘文化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出了鲜明的湖湘文化色彩。

同、光之际，湖南文化发生了裂变现象。一方面是洋务思潮的

兴起，而另一方面是保守势力的急剧发展和文化守旧复古风气的弥漫。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国内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将目光转向了世界。魏源在编撰《皇朝经世文编》和协助陶澍改革盐漕政务后，就遇上了鸦片战争，他亲自参与了抵御外侵略者的斗争，初步接触到了西方世界的一些东西。鸦片战争失败给了他思想上以巨大的刺激，他开始考虑富国强兵、抵御外侮诸问题，于是著《圣武记》首次提出要“以彼长技御彼长技”。随后，又受林则徐之托，搜采欧美各国国情地理以著中国攻守之宜，成《海国图志》一百卷，再次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也就成了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士之一，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至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势态逐渐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迅速增多。清王朝内部一些较有眼光的人士深感中国社会正面临一大变局，他们从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从与帝国主义一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经历中，看到了西方炮船的威力，认识到要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必须走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于是逐次开展了所谓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主要率领者正是随着湘军集团走出省门国门，曾提倡经世致用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诸人。曾国藩在同太平军作战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西方洋枪洋炮的坚利和西洋轮船的疾速，看到了西方列强的不可一世和中国军队的软弱和不堪一战，于是开始萌发洋务思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时，就向清廷上折，提出将来应“师夷智造炮造船”。不久即在安庆设立军械所，仿造西洋炮船。攻陷金陵后，又在上海设立机器制造局，派人出国购置设备制造轮船。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他又进一步认识到

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于是又在机器制造局内设学堂，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和外语人才，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左宗棠也是与外国雇佣军一起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认识到“中国自强之策 除修明政事 精练兵勇外 必应仿造轮船”，于是在福建设立船政局，引进西方技术，延请外国工匠，制造轮船，设立学堂，培养中国的科技人才。郭嵩焘和曾纪泽是这一时期较早将目光转向西方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人。谭嗣同说：“世之称精通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①二人确实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佼佼者。郭嵩焘早年也是一名经世之士，他的洋务思想萌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一年他在辰州坐馆，常与张晓峰知府谈论禁烟之事，开始思考对付洋人的办法。“辛亥秋，权抚粤东，就所知与处断事理之当否，则凡洋人之所要求，皆可以理格之，其所阻抗，又皆可以礼通之，乃稍以自信。”^②他开始正式接触洋务。光绪二年（1876）奉使英法，才直接深入接触西方。出使的两年间，他深入考察了西方的工业生产、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特别是政治制度，从而形成了他的洋务思想。他力主大办洋务，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制器造船，更要学习西方国家的“政教修明”，学习其立国之本，而特别赞赏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他还批评中国封建官府对企业的控制，主张像西方一样，由商民自办企业，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他大声疾呼改革科举制度，大兴教育，培养人才，他是当时中国洋务运动中最激进的思想家之一。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通经史，工诗文，他又精于算术。父亲去世后，他在当时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开始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第 173 页。

郭嵩焘：《罪言存略》，《郭嵩焘诗文集》 岳麓书社 1984 年版 第 35 页。

接触西方科学文化，至而立之年又刻苦学习外语。光绪四年（1878）奉旨接替郭嵩焘充任出使英法大臣，后又兼任驻德、俄公使，在欧洲达八年之久。八年间，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考察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他反对顽固守旧，也反对全盘西化。他极力主张中国的知识分子既精中学，又懂西学，既保持中国的“声明文物，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又“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他主张在当今情势之下，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广泛的交流，不能固步自封，既不可害怕，也不能自卑。办理中外交涉，应以中国的情理为准绳。

但这一时期湖南境内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却显得异常保守。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湖南又恢复了平静，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尤其是湖南的士绅势力在平定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大大增长，绅士队伍除了十多年积聚起来的退職官员和科考取得名功的士子外，还崛起了一大批军功出身、荐举出身和捐纳出身的人员。这些人对湖南社会和文教风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们把持着各府州县的军、政、财、教大权，总揽着地方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人恰恰又极端顽固保守，因而同、光之际的湖南成了全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首先是全省出现了文化复古之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湖南的封建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士绅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恢复传统文化，于是省及各府州县掀起了重修地方志的高潮，掀起了为湘军死难者修祠表彰的高潮。又重建各地被毁的学校和书院，据统计，湖南境内的学校书院有一半均重修于咸丰末与同治年间。一些头面人物如曾国藩兄弟、刘锦棠等则集资大量刊刻古籍，印发各种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书籍。其次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反“洋”。光绪二年，郭嵩焘奉旨出使英法，消息传来，湖南绅士一片辱骂之声，长沙士绅中流传着一副讽